

元代中期“李孟”主题集体书写考论

刘 育

内容提要：李孟是元代中期仁宗一朝的辅弼良臣，虽不以文学大家的身份名世，但因特殊的仕履经历及影响力而在文坛引发共鸣。一系列以“李孟”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应时而生。一方面，仁宗加诸集体化写作行为中的权威彰显出新君执政之初树立典范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在朝文人的轮番参与映射出该群体的时代认同、“大人”之梦与归隐渴望。在集体的书写中，一个层次丰富的文臣楷模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该群体也借由诗文写作将李孟和仁宗及其时代的紧密关系进行塑形，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于历史和自我的双重建构。

关键词：李孟 元仁宗 集体化创作 双重建构

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元史》卷一七五有传。他以侍读身份陪伴元仁宗成长，见证并高度参与了仁宗治世。其忠君之心、辅治之功和归隐渴望，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书写对象。同时，仁宗给予他的认可和推崇，既满足新政之下树立典范和道德构建的政治意图，亦与当时以儒治国的时政理念相符，遂在文臣之间引起了积极回应，引发了一番以“李孟”为主题的集体化创作景象。相关作品既以文学化的方式呈现了元代中期的一段历史，也表露出庙堂文人的共性心理。

一 仁宗和李孟的师生、君臣之谊

据《元史》本传记载，李孟长于古今治乱之说且志向远大。^①不过从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除了被裕宗召见于东宫(未及见用而裕宗没)，以及其后短暂在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府上担任塾师之外，他多数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无意于仕进的姿态，断然拒绝了来自各方的连番荐举。^②如果考虑到杨吉丁是将李孟推荐至裕宗殿前的伯乐，因而李孟暂时接受过在其府宅教学的工作，那么年轻时的李孟在更多情况下宁可蜷居讲学也不肯就任吏职的本心是很明白的：伯乐之面虽不可强驳，但正如黄潜为其撰写行状时所言，县簿一类的职守实在“非其志也”^③。他一直在等待一次能够真正用志于当世的际遇。直到成宗即位后，时为皇太后的阔阔真寻访名儒辅导皇孙海山(武宗)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李孟因为此前已声名在外而再次获得推荐，由此抓住了至关重要的良机，成为了以后的帝王之师。

①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84页。

② 同上。

③ 黄潜《元故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平章政事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忠李公行状》，王颀点校《黄潜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05页。下文简称“《李公行状》”。

大德元年(1297)李孟开始以侍读身份陪辅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彼时海山年十七岁,爱育黎拔力八达只有十三岁。此后海山出镇漠北,遂有“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①的一师一生教学阶段,仁宗和李孟的君臣情谊自此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大德九年(1305),仁宗遭中宫之忌被外放怀州,“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②。没有史料证明此时李孟已能预见到自己的学生必将承继大统,但在这段仁宗平生的低谷期李孟始终不离左右,不但使“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更令仁宗于“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③与此同时,共历患难的情谊也加固了两人的关系,让仁宗在此后的岁月里对李孟充满了信赖,以至于有“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④的许诺。

仁宗即位初曾赐钞十万贯于李孟,以为其治第之用,然而后者却拒绝道:“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⑤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驾崩,时为太子的武宗海山远在漠北,安西王阿难答在成宗皇后的支持下谋继大统,随即引发了一场宫廷政变。李孟在此期间的一系列作为,充分说明他早已将自己志在为天下苍生的宏愿寄托在了学生身上。其一,他身为人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时慷慨陈词,先谈:“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晏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庭,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再言:“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⑥,入情入理地帮助和鼓励学生对关键性问题作出迅速、正确的判断。其二,不同于一般儒士的文弱形象,李孟在先行去往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家中会议时,后者正遭遇成宗皇后连番派人探病、实为严密监视的困局。于是他镇定自若地将自己假扮为医者,“长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诊其脉”^⑦,有勇有谋地化险为夷,为下一步的平乱行动争取到了时间和机会。其三,当己方阵营有人建议应当等待海山兵马到来后再作打算时,李孟力言一旦错过时机,待两强相斗必将“生民涂炭,宗社危矣”,并接连以“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无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的儒家之道极力敦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行动。^⑧这表露出他忠于仁宗并托志于仁宗的强烈“私心”:无论如何,李孟都坚持以仁宗为先——他希望由爱育黎拔力八达而非海山取得平乱之功,自然也期待这样的功勋能够帮助前者登上王位,从而将个人“每考论古今治乱盛衰之故,慨然有志于当世”^⑨的理想抱负付诸实践。

李孟的这份“私心”还将从随后发生的两个事件里得到印证。一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提出以卜筮问吉凶时,李孟竟事先与卜人议定,“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⑩,以确保仁宗下定决心前的最后一个环节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4页。

② 同上书,第4085页。

③ 同上书,第4084、4085页。

④ 同上书,第4088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4085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4086页。

⑨ 黄溍《李公行状》,王颀点校《黄溍集》第3册,第704页。

⑩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6页。

不容有失。二是在事成后由弟监国、待兄即位的局面下,先有李孟自陈“执政大臣,当自天子亲用,今鸾舆在道,孟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任”,随即遁走隐居,后有武宗听闻“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之“内幕”。^①这也表明了李孟在发生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这场皇位争端中所持的明确立场。不仅如此,有元史学者甚至推测后来看似和平过渡的武、仁授受“实际上是又一场皇位之争”,同时强调李孟再次于其间起到的关键作用,“可见在武宗末年的这场斗争中,他也曾出谋划策,为保仁宗的皇储地位和顺利登基立了大功。”^②

总而言之,自教导十三岁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起,至其二十七岁登上王位,李孟在得到这个他等待已久的机会后,其尽心尽力之付出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十数年如一日地苦心传播儒学,还是有胆有识地参与谋划并最终助仁宗完成从皇子到皇帝的身份转换,应该说,李孟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其忠心与才干。正因如此,仁宗对李孟的倚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李孟随之得到晋升与重用,成为了见证并高度参与仁宗治世的股肱之臣。仁宗曾言:“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元史》也将仁宗“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的识见归因为“实孟启之也”,甚至把他之于仁宗朝的重要性定义为“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一令之善,必归之于孟焉”。^③

二 仁宗朝以“李孟”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现象

具体到这一时期爱贤尚文的政治风向来看^④,李孟的言行与付出实无愧于仁宗的称赞与史家的好评。一方面,仁宗“临御天下,慨然悯习俗之弊于文法,思得儒臣以图治功”^⑤的理念,本质上是基于李孟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少年时即已为其播种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除了直接给予统治者以观念影响,并参与制定和落实朝廷层面的用人方针之外,李孟也积极利用个人的权威和声望,以伯乐之姿为仁宗及其时代发掘和提携可用之才,展现了“力能进退天下之士,而无一毫疏戚薄厚爱憎之心置其间,一务于为国而得人”^⑥的风范。在此背景下,以“李孟”为主题的集体化文学创作遂成为这一时代的独特现象。

(一) 仁宗的身体力行与文人的认同回应:李孟画像同题集咏

至大四年(1311),仁宗以秦国公之号为李孟赐爵后,要求朝臣为李孟的画像作赞。姚燧序其经过曰:

陛下之未出阁,由李道复日侍讲读,亲而敬之。尝召绘工,惟肖其形,赐号“秋谷”,命集贤大学士王颙大书之,手刻为扁,而署其上,又侧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极,制授道复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以尽学焉。后臣之义,装潢是图,填金刻扁,而摹赐号与御署,卷加标轴。宠耀至矣,人孰与侔?敕臣燧序之,将俾词臣颂歌其下,而亲览焉。^⑦

①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7页。

②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9—660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8、4085、4090页。

④ 参见刘育《元仁宗爱贤尚文意志下的文坛样态平议》,《前沿》2022年第4期。

⑤ 苏天爵《御史中丞马公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⑥ 揭傒斯《上李秦公书》,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⑦ 姚燧《李平章画像序》,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通过该文的记录可知,此次应制的对象其实是早在大德三年(1299)即已完成的一幅画像。彼时身为皇子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接受李孟的儒道讲授仅有两年,然已“亲而敬之”,又亲手在画像旁边署字,显露出仁宗从少年时就对儒家文化产生极大兴趣,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李孟的教育成果。

而且从学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言行表现来看,仅仅是在其入主东宫之前的这段时期,李孟的春风化雨之功就已非常显著。《元史》本纪记载,仁宗当年在前往怀州的路上,“所过郡县,供帐华侈,悉令撤去,严飭扈从毋扰于民,且谕金事王毅察而言之,民皆感悦”,经过邯郸时,“谕县官曰:‘吾虑卫士不法,胥吏科敛,重为民困。’乃命王傅巡行察之。”^①显然,渗透于这些命令中的核心理念正是儒家崇尚的民本观,代表着年轻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其所受儒家教育而产生的理解与实践。此后在返回大都平定安西王叛乱的途中,仁宗的言行再一次体现出其用心修习圣贤之道的必然成果。据史料记载:

至漳河,值大风雪,田叟有以孟粥进者,近侍却不受。爱育黎拔力八达曰:“汉光武尝为寇兵

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备尝艰难,罔知稼穡,以致骄惰。”命取食之,赐叟绫一匹,慰遣之。^②

在这则颇富画面感的故事里,无论是脱口而出的引经据典,还是大丈夫当备尝艰难的人生理论,乃至“稼穡”“骄惰”之说,都深具师者李孟的教育印记。加之李孟更是帮助爱育黎拔力八达登上帝位的关键功臣,学生对老师的尊崇自是不言而喻。

由此观之,李孟的画像得到填金刻匾、御署名号的重新装裱,以及词臣颂歌、皇帝亲览的至高待遇,其间的涵义是丰富而微妙的。一方面,仁宗甫一称帝便以君主之威对老师的地位进行强烈肯定,这无疑符合儒家尊师重道的基本观念。因此,仁宗的这道指令首先便在展现师生融洽关系的同时,凸显了深谙礼数道德的仁君形象。另一方面,参与颂歌的文臣们则通过此次应制创作,回顾了李孟其人其行的时代意义,并在由此感受到的儒治氛围中加强了凝聚与认同。

其中,同恕赞曰:“昔也龙渊,以羽以翼。今焉凤池,伊契伊稷。培植太平,仁膏义泽。”^③他称赞了李孟对仁宗多年的辅佐之功,喻之以“羽翼”,比之为“契”“稷”。蒲道源在《秋谷平章真容赞》小序中则说:“某伏在田里,恭闻秋谷平章秦国公有大勋于帝室,诏画工图其容,仍命词臣等赞颂,宠渥至矣。窃谓君臣际会,古今盛事。太平之业,实基于此”^④。将仁宗和李孟的关系定义为“君臣际会”的盛事。赵孟頫更在《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中这样形容:“谁能动天子,今复见山人。始白诗书效,行看俗化淳。”^⑤李孟的意见对于仁宗的影响力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显明的事实。而李孟亦充分借助这一影响力以及仁宗选择以儒治国的思想倾向,将整个朝廷的文明程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元立国后停废多年的科举考试得以在仁宗时代重新恢复,实与李孟循循善诱的潜移默化之功密不可分。^⑥对此,程钜夫在李孟画像赞文里写道:“历观宰辅,久无儒者。潜龙羽翼,公乃大雅。帝曰旧学,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权舆。熙运方开,明良起喜。如龙而云,如鱼而水。任以天下,可谓大臣。劳谦得士,清静宁民”^⑦,特别强调了在李孟这位儒者的带动下,

① 宋濂等《元史》卷二四,第2册,第535—536页。

②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2页。

③ 同恕《李平章秋谷赞》,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④ 蒲道源《秋谷平章真容赞并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⑤ 赵孟頫《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钱伟强点校《赵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⑥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9页。

⑦ 程钜夫《李秋谷画像赞》,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朝野间“得士”和“清静宁民”的状态,并将此归结为“真儒之效”。同时,以程钜夫多朝元老的身份做出“历观宰辅,久无儒者”的定调,这和前文蒲氏所说的“太平之业”以及同恕所说的“培植太平,仁膏义泽”相仿。其中既有对李孟的赞美,更包含着写作者们立足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视野给予仁宗帝业的强烈认同。换言之,众人借由这次针对李孟画像的应制奉和表达共识:他们都认可儒者李孟之于仁宗时代的关键作用及其苦心缔造的太平盛世之成果。

(二)时代激活的“大人”之梦 翰林文人有关“李孟”主题的其他创作

对活跃在朝堂之上的翰林文人来说,仁宗对李孟的器重,以及李孟个人以白衣书生的身份建功立业、影响统治者决策,进而革新时政面貌的成就俨然成为了一种典范。文人们不仅在皇帝的命题作文中感受着这种典范的力量,而且也在其他有关“李孟”的创作活动中书写着身逢盛世的荣耀与自信。

这类创作的第一种形式是贺寿诗词。翻检元人文集可见,现存以为李孟贺寿为主题的作品大致如下表所列:

表一 “李孟寿日”主题相关作品概览

作者	题目	文体
程钜夫	寿李秋谷	五言古诗
	清平乐·寿李秋谷	词
	沁园春·寿李秋谷平章十一月朔	词
刘敏中	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一)	七言律诗
	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二)	七言律诗
赵孟頫	寿平章李韩公	七言律诗
袁桷	寿李承旨四十韵	五言古诗
	寿李承旨(其一)	七言律诗
	寿李承旨(其二)	七言律诗
马祖常	秋谷平章生日	五言古诗
	寿故相秋谷	七言律诗
蒲道源	寿秋谷平章(其一)	七言律诗
	寿秋谷平章(其二)	七言律诗
	寿秋谷平章延祐五年十一月一日	七言律诗
	清平乐·寿李平章	词
许有壬	寿李秋谷平章	七言律诗
张野	寿李秋谷	七言律诗

这些诗词创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是奉题而作,但其内容却普遍与李孟的政治贡献及成就相关联。例如马祖常的《秋谷平章生日》^①一诗开篇便言:“上宰儒宗重,中台位望隆”,首先建立起仁宗重儒和李孟见遇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说:“造命毗元化,书思沃帝聪。山河尊社稷,礼乐赖臣工”,则是进一步将儒治带来的礼乐教化之风归功于李孟的付出。诗歌最后写道:“洛下耆英盛,人间寿域同。君王自养老,何羨菊潭东”,展现出仁宗治下一派老有所养的和谐景象。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祖常在尾句跳脱了贺寿的写

^① 马祖常《秋谷平章生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2页。

作主题,将本该致以李孟的压轴祝福转移到了仁宗身上,以菊潭之水可以益寿延年的典故^①表达出对于君主的拥护。这样的做法令人想见:以仁宗对李孟的倚重,在他即位后的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赋诗咏词为李孟祝寿,这或许本就是一种出自帝王授意,或至少是符合仁宗心意的传统。如此我们便能理解在《秋谷平章生日》的诗题下高唱“君王自养老,何羨菊潭东”的“跑调”,其实正暗示出诗人在寿星以外另设的一位潜在读者。

又如蒲道源《寿秋谷平章》诗写:“硕材扶护赖玄功,已与明堂作栋隆。江汉炳灵虽借重,乾坤间气自难同。勋名真似韩忠献,寿考当逾郭令公。更为皇家建邦本,异时绿野乐无穷。”^②诗人同样以李孟的匡扶社稷之功作为主要写作素材,“更为皇家建邦本”的表述则将其教授给仁宗的以儒治国理念当作李孟更深一层的功德加以赞颂。再如许有壬在《寿李秋谷平章》里称李孟为得闲宰相^③,在表面上赞誉个体的同时将深层笔触指向了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与此相似地,程钜夫也在《次韵秋谷西郊书事》诗中表彰道:“高贤自古闲难得,夹道争瞻李相君”^④;虞集则在为李孟所作的《知还斋记》里提到:“及天子即位,公以旧学为之相。大纲细目,疏治条理,不紊不遗,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与天子坐论道德,治乎无为。”^⑤以上许有壬、程钜夫和虞集不无相似的描述,显然都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⑥的理想境界作为范本。文人们对于这种儒治新风的认同感,以及时人乐于将仁宗比之尧、舜的书写模式^⑦,在此达成了契合。

程钜夫的《寿李秋谷》^⑧可以说是为李孟庆寿创作中的巨制,长达三十联共三百字。诗人对李孟以身试险助爱育黎拔力八达平乱并终得帝位的史实赞赏不已,以“赤手除蛟虎,丹心见藿葵”的描写为身为儒士的主人公注入了忠肝义胆的侠骨风姿,也再次彰显了李孟在大德末年乱局中建立的功勋。与此同时,程钜夫同样没有忘记颂扬这个时代的进步,他说:“乡校惟闻颂,朝廷总得宜。端由天子圣,亦在哲人推”。在这里身为老臣的诗人把天子之圣和哲人之推进行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他笔下,“哲人”李孟有着“报主期尧舜,为臣志吕伊”的壮志情怀,同时也具备“功高门似水,心静爵空縻”的淡泊高尚。这与其说是单纯地就事论事,为李孟的寿日作文,倒不如说在洋洋洒洒不能停笔的同时,诗人的思绪里也正流淌着个人心事。这种心事绝非比较——他替世祖赴江南访贤结出的硕果,与李孟辅佐仁宗缔造儒治盛世,在勋名上并无一较高下的必要性。真正重要的是,程钜夫一定在李孟身上看到了自己毕生致君尧舜、为臣吕伊的理想与实践。有学者提出,“作为南人官员,程钜夫以大一统王朝的理念为南方融入大元王朝而奔走呼告,也以南北一统的理念重塑新王朝的思考方式与思维视野”,甚至倡言“对于整个元王朝来说,如果没有程钜夫的努力,他们就不算真正拥有南方”。^⑨由此观之,同样是为有元一代的发展建功立业,诗人用

① 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三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79页。

② 蒲道源《寿秋谷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9册,第287页。

③ 参见许有壬《寿李秋谷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4册,第321页。

④ 程钜夫《次韵秋谷西郊书事》,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5册,第273页。

⑤ 虞集《知还斋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35页。

⑥ 朱熹注《周易》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⑦ 如李孟就直称仁宗为“尧、舜之主也”。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8页。范梈亦认为自己“生逢尧舜世”。参见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6册,第417页。再如赵孟頫在皇庆改元伊始盛赞仁宗为“天生圣人,千载稀有”。参见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05页。

⑧ 程钜夫《寿李秋谷》,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5册,第272页。

⑨ 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他给予李孟的称赞 暗述了自己“功高门似水 心静爵空糜”的选择。在诗歌最后程钜夫说：“即此观天道，宜能永福绥。直为天下祝，不是老夫私”这一心系社稷苍生的胸襟既出自诗人本身，又可说是为李孟所作的代言，吐露了他们最本质的儒者情怀。

元史学家曾言：“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加上尊孔和崇奉儒术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士人，很快便认同元朝的统治，纷纷谋求入仕，歌功颂德的诗文随处可见。”^①可以说，其中“巩固”“尊孔”“崇奉儒术”等描述与仁宗朝的情形最是切近。的确，与程钜夫诗歌咏本朝天道永福绥相仿，前述各篇为李孟贺寿的诗作也都或多或少有这类看似“歌功颂德”的言辞。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仁宗以儒治国、爱贤尚文营造出的接近中原王朝的氛围，让这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文人深感身逢其时。比起流于表面的歌功颂德，一众文人希望现有政治风向长久延续，进而为现任君王祈福禱寿的写作意图想必更是出于真心的自然流露。

这类创作的第二种形式是在朝文人和李孟之间的交游之作，包括赠诗、和诗、记文等。其中，虞集执笔的《知还斋记》起笔便直奔文题曰：“相国李秦公，治小斋于居第之后，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语，名之曰‘知还’，而命集记之。”^②接下来，他先对身居要位者必求高明广大之居的普遍现象给出合理化的解释道：“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虑。虑周天下，则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劳矣。于是求高明广大之居，以佚其身，休其气息。其聪明之用，以待事物之无穷者，人之所同也”继而将李孟从皇子之师到帝王之师的非凡成就总结为“四海晏然蒙其泽而莫之觉，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由此点明方丈小斋即可容纳彼身是因为对方在德业修为上达到了至高境界，完成了对于李孟的第一重赞扬。^③此后，虞集进一步写道：

朝出乎乔林，而夕返乎一枝者，众鸟也。故隐民远土，得以寄兴而自喻。乃若鸣凤，历数千百载而一出，其进退岂直系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为进退者，庶士之事也。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系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于此，是岂以功名富贵易其心者哉？^④

显然，这里“岂以功名富贵易其心”的感慨，正与李孟对仁宗所言“臣布衣际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贵之谓也”之陈辞相符。换言之，虞集的文字及李孟治小斋以自处的选择，都令我们看到后者拒绝仁宗十万贯赐钞的行为是本心为之而非沽名钓誉。更为重要的是，虞集在记文中以众鸟和鸣凤为喻，认为以保全自身为要务、应朝夕之时相机而动如同众鸟，的确是很多人会走的路，但李孟这样的人则像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鸣凤。他的存在意义与众不同，必不限于只关注自我，由此完成了第二重褒扬，极大肯定了李孟为行道而进退的“大人”品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虞集的文章将众鸟和鸣凤的差异作为称赞李孟的切入点，显然有别于其他同僚在相关创作里重点强调的手定乾坤和辅治盛世之功，实则是把李孟的具体功绩升华为了进退行藏的自我抉择，在此基础上强调并歌颂了一种“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的品质。如此异乎他人的关注角度不

① 陈高华《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② 虞集《知还斋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第63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636页。

能不令人联想到另一个“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且又与虞集关系密切的人。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兵临采石。理论上本无武将身份亦无督战责任的虞允文在危机面前挺身而出,最终使“敌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议和”^①,为南宋赢得了安宁之机,被杨万里赞许为“负荷偏宜重,经纶别有源。雪山真将相,赤壁再乾坤”^②。毫无疑问,这亦是《知还斋记》所称赏的“以身系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的“大人之事”。作为虞允文的五世孙,虞集在为李孟所作的记文中抓住了其与先祖尤为相似的“大人”品质,这恐怕不会只是巧合。一个是曾在南宋“出入将相”“忠勤无二”^③的家族丰碑,另一个则是本朝功勋卓越的辅弼之臣。应该说他们之间从表至里的相似,是虞集在夸赞李孟时与他人选择的切入角度颇有不同的关键原因。在《知还斋记》一文中,虞集既赞美了李孟,也致敬了虞氏先贤,同时在一为明写、一为暗写的今古交错中,隐埋着自己对“大人”之梦的向往。

不仅如此,文章起笔就先强调小斋名曰“知还”,其后又在短短百余字里三提“进退”。这表明正如熟悉先祖虞允文的“晚际时艰”^④一样,作为朝堂同僚的虞集很清楚李孟在仕途上经历过的进退维谷,也因此更崇敬对方为天下而舍己的无私。事实上,除了前文提及武宗即位后李孟曾惧祸遁走的一段经历,这位受到万众瞩目,甚至从老翁到孩童、从渔人到樵民都无人不晓^⑤的宰臣曾多次萌生退意。第一次是在仁宗初登基时,《元史》本传说他“在政府,虽多所补益,而自视常若不及,尝因间请曰:‘臣学圣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尧、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为尧、舜之民,上负陛下,下负所学,乞解罢政权,避贤路。’”^⑥毋庸讳言,李孟这段请辞理由乍看上去兼有恭维和自谦的双重意图。但如果考虑到至大三年(1310)李孟经由当时身为皇太子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荐举,开始在武宗朝任职后,“力以国事为己任,节赐与,重名爵,核太官之滥费,汰宿卫之冗员。贵戚近臣,恶其不便于己”^⑦,那么可想而知,即便已经迈入新朝,但与一部分贵戚近臣结下的往日恩怨以及李孟本身刚正不阿的行事风格,恐怕仍在给他带来困扰。此后他锲而不舍地多次向仁宗告还,更是清晰证明了这一点。皇庆元年(1312)末,李孟归葬父母回朝,再次提出“谢事”之请,仁宗不允;皇庆二年(1313),李孟“乞还国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请”;延祐二年(1315),李孟复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权归田里”。^⑧根据黄溍的说法,这个以体衰多病为由辞任职事的请求在其后的几年还曾数番出现,但直到延祐六年(1319)仁宗“乃从所乞”^⑨。

客观来看,李孟的困境不止虞集一人看在眼里,张养浩也于《寄李道复平章》一诗中特别提到:“盛名自古多难处,好及明时乞此身”^⑩。许有壬更在写于李孟辞世二十七年后《秋谷文集序》中明言,其当年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三,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95页。

② 杨万里《虞丞相挽词三首(其一)》,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154页。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三八三,第34册,第11800页。

④ 同上。

⑤ 参见刘敏中《次李秋谷平章寿日诗韵(其二)》,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1册,第368页。

⑥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8页。

⑦ 同上书,第4087页。

⑧ 同上书,第4089页。

⑨ 黄溍《李公行状》,王珣点校《黄溍集》第3册,第707页。

⑩ 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5册,第49页。

在武宗朝秉公处事的业绩实为“挺身任之，灼知将来之危而不恤也”^①。这里所谓“将来之危”，自然是作者在写作当时已经亲见亲闻的某种事实。

可是作为李孟来说，他并未因为始终存在于内心的退意而对朝堂之事消极怠慢。尤其是在皇庆二年（1313）乞还秦国公印后，李孟仍在与仁宗论议朝廷用人之道时循循善诱并极力促成了元代科举制度的施行，协助仁宗完成了其儒治策略的代表性成果。延祐初行科举之时，李孟曾自述心志曰：“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龙颜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②这虽然是即事赋诗，但其中包含的却是李孟奉守一生的信条。从诗中可以看到，尽管李孟有无力之感，但他仍时刻将“圣情”挂怀，不忘“慨然有志于当世”的初心。蒲道源在《跋秋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一文中写道：“公尽心其事，于试院中作诗七言一章凡八句。其所以颂熙朝之盛事，劝士子之为忠，以报方今之荣遇。思得真儒实材，以辅成太平之治。且自退托于不能，意无不备”^③，亦是对友人复杂心声的一番代述。

尽管李孟与仁宗师生情深，仁宗与李孟君臣遇合，但这并不能消解李孟让其他蒙古统治阶层利益受损所累加起来的敌意。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有用世之心，却也向往风平浪静的退隐生活。李孟曾自谦道：“西望家山咫尺间，白头多病不知还。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④，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个人在宦途现实层面和身体心理层面遭遇的困局。这与友人蒲道源从其《初科知贡举》一诗中明白感知到的“自退”之意如出一辙。然而在此情形下，李孟对朝廷、对仁宗依然“尽心其事”，他希望为仁宗网罗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最终达到“太平之治”的远景目标。此后的历史也证明延祐首科选拔出的张起岩、欧阳玄、许有壬、杨载、马祖常、黄潛等人，多成为了元中后期声望显著、影响深远的一代人物，得人之精准让李孟之鞠躬尽瘁于此又可见一斑。《知还斋记》所言“进退不系其身，而系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系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可谓不虚。

此外，相关主题交游之作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郝天挺、程钜夫、赵孟頫、张养浩、虞集、卢亘、王执谦、蒲道源、完颜德辉等人。虽然与品题画像、集体贺寿的情况相比，交游之作的应制成分更少而私人属性进一步提升，但从其中具体的内容来看，我们依然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围绕李孟展开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时政的内涵密不可分。例如卢亘《奉和李秋谷平章宿西郊》诗写：“无象太平今有象，共欣良相遇明君”^⑤，赵孟頫《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亦云：“鱼水千年庆，龙云亿载春。乾元开泰运，圣主得贤臣”^⑥，可见无论是明君仁宗和贤相李孟的形象，还是李孟与仁宗治世的绝对关联，在时人心中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一贯印象。诗人们也总是热衷于以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去表达对于友人李孟的情感。如王执谦《赠李道复》写：“鞍马西来气吐虹，名声一日压诸公。面陈王霸龙庭上，手拔乾坤虎口中”^⑦，以一连串的动态描绘赞叹了李孟应对复杂局势的从容不迫。又如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诗言：“文武才全每许君，逢时谈笑建奇勋。世称

①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② 李孟《初科知贡举》，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第35页。

③ 蒲道源《跋秋谷平章试院中所作诗》，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第226页。

④ 李孟《在朝思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第37页。

⑤ 卢亘《奉和李秋谷平章宿西郊》，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7册，第117页。

⑥ 赵孟頫《奉赠平章李相公十韵》，钱伟强点校《赵孟頫集》，第94页。

⑦ 王执谦《赠李道复》，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2册，第84页。

李道为贤相,帝重严陵是故人”^①。除了赞赏之情以外,所谓“文武才全每许君”的说法,也隐含着时人讨论文武全才的话题时总会不约而同想到李孟的细节场景,显示出李孟及其成就的功业在当时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更进一步而言,这种话题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仁宗儒治的大环境激活了传统儒家观念为古往今来的士人定立的那个“大人”梦想。

(三)翰林文人的归隐渴望:李孟与黄一清的《秋江钓月图》

除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典范意义之外,李孟与士人黄一清的交往渊源则展现出他身上存在的又一重代表性特征,这赋予了翰林文人另一种模式的书写兴致。

黄一清(1263—1337),字清夫,号秋江,休宁(今属安徽黄山)人。关于他以布衣之身结交宰执李孟的因缘,黄溍在《秋江黄君墓志铭》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追溯,其文曰:

洎李公以旧学相仁宗,贤才汇进,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复入京师谒李公。君古貌长身,须髯如戟,宽衣高冠,容止简率。又作吴语,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见大惊异,即下执其手,延之上座。时公门下皆名人显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间,恒与公亢礼,坐客莫出其右,隐然名动京师。君以秋江自号,而李公自号秋谷,遗君诗有“君钓秋江月,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之句,朝野传诵满口。^②

在这段描述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重点:一是仁宗时代爱贤尚文背景下“贤才汇进”的热烈风气。二是李孟作为当朝宰臣对此一风气的助推作用。三是具体到黄一清个人而言,他的命运在遇到李孟前后发生的转变。这种转变最显著的结果是李孟对其的青睐引发的名动京师效应,使得黄一清每至大都,都能获得入仕机遇。^③但让人意外的是,受到伯乐青睐的黄一清并没有自此走上仕宦大道。相反,面对一次次推荐他总是选择婉言谢绝,并对此解释道:“吾以布衣缔交相国,荣孰大焉?持此足以复吾亲矣。”^④

从儒家的入世观来看,黄一清始终坚持独善其身的做法,与李孟这样志在兼善天下且无论境遇如何都勉力为之的儒臣相比较,似乎显得不够无私和伟大。但这样的人生选择却又显然触动了进取者们的心灵。除了李孟的赠诗,黄一清和他的《秋江钓月图》也得到了程钜夫、赵孟頫、曹伯启、袁桷、范梈、杨载、马祖常、陈泰、胡助等人的题诗。如曹伯启诗“桂影扶疏漾碧流,高人归隐坐垂钩。乾坤空廓心无际,雨笠烟蓑老即休”^⑤,程钜夫诗“荷蓑非避世,持竿不求赏。夙抱江海心,宁为利名鞅。天明紫烟里,日暮清波上。四顾无人知,孤舟自来往”^⑥,赵孟頫诗“尘土染人衣袂,烟波着我船窗。为问行歌都市,何如钓月秋江”^⑦,范梈诗“旧识先生隐者流,倘因图画想沧洲。断云满路碧窗晚,明月何年青嶂秋。世故风尘双短屐,生涯天地一扁舟。何由白石空矶畔,招得人间万户侯”^⑧。在这些身居翰林的文人笔下,黄一清出乎尘世之外的个性和钓月秋江的画中人浑然一体,演绎着各人心中的隐逸梦想。其中,赵孟頫别出心裁的六言诗仅用二十

① 张养浩《寄李道复平章》,杨讷主编《全元诗》第25册,第49页。

② 黄溍《秋江黄君墓志铭》,王颀点校《黄溍集》第4册,第940页。

③ 同上书,第940—941页。

④ 同上书,第940页。

⑤ 曹伯启《题黄秋江钓月图二首(其二)》,杨讷主编《全元诗》第17册,第392页。

⑥ 程钜夫《秋江钓月》,杨讷主编《全元诗》第15册,第286页。

⑦ 赵孟頫《黄清夫秋江钓月图》,钱伟强点校《赵孟頫集》,第139页。

⑧ 范梈《题黄隐君秋江钓月图》,杨讷主编《全元诗》第26册,第446页。

四字就表明了诗人对行歌都市和钓月秋江两种选择的态度,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寓意深刻。其中既有对作画者自由洒脱的钦羡,又向同僚李孟给予黄一清的青睐投射了共感,更借此言说了写作者个人向往秋江钓月的心曲,在有限的篇幅内赋予这首题画诗以多维的意蕴。再如程钜夫、范梈的作品则在赵孟頫“行歌都市”的诗意表达之外,更加明确地点出了富贵名利的概念,以此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孤舟隐者形成对立,借由画中人达成了一种自我寄托。

不过,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相关作品恐怕只是原貌的一小部分。因为元代隐士陈栎曾在延祐二年(1315)撰写的《赠黄秋江序》一文中,将黄一清当年自大都返家时携带的公卿交游之作描述为“巨帙”,介绍其中“会粹题名,作自平章秦国公而下,贤卿大夫、新进士诗文咸在,雅雅奇奇,并蓄兼收”^①。其中李孟的诗作不仅是最为知名的一首,而且也是表露心迹最为明确的一首:

君钓秋江水,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老我素多病,壮君高出群。何时各归去,云月总平分。^②

在笔者看来,黄溍在《秋江黄君墓志铭》中引用此诗时省略掉的诗歌后两联,既表现出李孟再一次申明自己的“退意”,同时更以一种刻意洒脱的结尾凸显出诗人羡慕黄一清的恣意人生却不可得的两难与无奈。

客观地说,仕隐问题并不是元代文人独有的纠结,但是对李孟以及像他一样有志于学以致用、惠泽天下的传统儒士来说,他们面对的为难既有一般意义上抉择进退的心灵困境,也关涉身在王朝中的人身安危。然而正如许有壬多年以后的“后见之明”——“灼知将来之危而不恤也”——李孟和他的同伴们向往归去却又总是知难而进。应该说,相较于单纯的向往田园,这才是李孟给黄一清这样一位普通士人的赠诗被在朝文人反复咀嚼以致“朝野传诵满口”的深层原因,也是众人进而纷纷为之歌咏的同理心境所在。这种情绪集中体现于张养浩的《李平章还山亭记》一文:

或曰:“土方穷处,其志未尝不欲用世,今秦国公天子大臣,两定内难,不可谓道不行;军国重务,奏无不允,不可谓言不听。夫人臣亟于退者,不越远谗避祸二焉耳矣。盖谗不必远,当正身率物,使谗言无隙之入为可法;祸不必避,当殚诚为国,使祸患不自我作为可师。允能是,则庙堂之高与山林之邃也,奚其异?”仆曰:“之言也,固臣子律己之上策。然闻之: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审机隆盛而戒进于满盈,初非藉以自全。盖阴阳消长、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况一治一乱,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有数存乎其间。圣人不语及者,盖恐国家有所倚而不力于治理故也……尝谓山林之乐,造物甚靳而不轻以畀人。苟非其人,虽见留于暂,终必假轩裳以去之。以是知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填服于是。”^③

作者在文章中虚拟出了一个他者来与自己辩论。对于他者提出人臣只要正身率物、殚诚为国就无须远谗避祸的观点,张养浩含蓄地予以否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当中的境界。换言之,他很理解李孟的处境,更借国家治乱实有定数之说指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无论李孟如何贵为天子大臣,他能发挥的力量终究都是有限的。然而在局限之中寻求突破、行道立业,这才是李孟“福德俱盛”的缘由所在。如果我们考

① 陈栎《赠黄秋江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② 李孟《赠黄秋江处士》,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第36页。

③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8—629页。

虑到张养浩本人也曾致仕闲居,却在朝廷需要之时义无反顾担起重责最终以身殉职的悲壮经历^①,就会发现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对庙堂之高与山林之邃的理解,绝不只是针对李孟就事论事,而是渗透着其个人的真实心意和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少有涉及所记对象的细节风貌,而是别出机杼地以“或”与“仆”之间的对话来结构全文,正是因为写作者有托还山亭言己志、借李孟请求表达自我的深层意图。

三 文学书写背后的历史与自我建构

要而论之,“李孟”作为一个主题对象引发的文学创作在仁宗时代是被在朝文人们积极接受的。这一方面源于仁宗由上而下带有政治意图的推动和授意,同时也包裹着他在传统儒家思维下对师者李孟的尊崇之心。另一方面,李孟之所以能够成为仁宗想要树立的典范,其本质原因更在于他身居其位、善谋其政,将自孔、孟以来传统读书人所秉持的忠信仁爱、兼善天下之高贵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李孟前后辈同僚们的认可与钦羡,从而促成了另一种自下而上,既褒扬李孟也称颂时代的创作情绪。

当然,正如历史学者所言,“‘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此‘情境’指的并非文本内的上下关系,而是产生此文本(以及事件)的社会情境或人类生态情境。”^②也就是说,“李孟”主题的诗文写作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文本,归根结底都存在于仁宗朝独特的情境之中。通过以上有关“李孟”的集体化创作可以看到,仁宗朝的文人既借由笔墨记录并建构起一段元代中期的儒治历史,同时亦借此完成了另一层关于自我的建构。

本文此前曾讨论过李孟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宫廷政变中为仁宗平乱,继而拿下皇位继承权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亦借鉴元史学家的观点,对他在看似和平过渡的武、仁授受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所提及。^③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史料和史论支撑下,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人们在“李孟”主题的创作里脱口而出“面陈王霸龙庭上,手拔乾坤虎口中”,“文武才全每许君,逢时谈笑建奇勋”,惊服于一介书生手定乾坤的霸气与成就。但是,仔细回顾史传的记载,其中的“逻辑漏洞”却是不可不察的。且看《元史·李孟传》写道:

仁宗曰:“当以卜决之。”

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

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献卦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桢且剿,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

孟曰:“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

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马,孟及诸臣皆步从,入自延春门。哈剌哈孙自东掖来就之,至殿廊,收首谋及同恶者,悉送都狱,奉御玺,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随以定。^④

① 参见刘育《论张养浩对杜甫诗歌和人格的接受与继承》,《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③ 参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第659—660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第4086页。按,为呈现这段记录中李孟给仁宗带来的显著影响,笔者有意对段落进行了拆分。

在这个版本的描述里,仁宗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说是由李孟直接促成的。最重要的是,当李孟将计就计用仁宗选择的占卜方式彻底打消后者犹豫不决的念头以后,整件事情便以一种极为流畅的节奏顺利发展,从“振袖而起”到“共扶上马”,自“诸臣步从”至与哈剌哈孙会合,史书通过“入”“至”“收”“送”“奉”“迎”“定”等一系列动作,向读者呈现了一场看似毫无抵抗和阻碍的平乱过程。但是,中国历史上无以计数的政变案例提供给我们的常识却是,对于一个意图铲除逆党、稳定朝局的夺权者来说,周围智士的锦囊妙计固然不可或缺,但得到武力方面的可靠支持则更是万不可少。

那么,发生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这次政变究竟是不是如上述材料所说的那样平和容易呢?恐怕不是。有元史研究者就认为,“有关成宗皇后的事及武宗即位经过,《元史》留下的记录,皆武宗、仁宗一派的片面之词,恐怕与真相大不相同”^①,同时对李孟在其间起到的作用亦质疑道:“当时曾有一场剧烈战斗,决不是李孟传所说,凭道理可以瓦解对方势力的。”^②至于这里没有详述的“剧烈战斗”实况如何,我们或可从《元史》中提到的两个细节里揣摩一番:一是《仁宗本纪》写当时进宫平乱时,“帝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③;二是《哈剌哈孙传》同样在讲到进宫这一时间点时,进一步明确道:“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诸王秃剌实手缚之……”^④

据此可见,跟随仁宗拨乱反正的入宫队伍并非仅是“孟及诸臣皆步从”形容得那样云淡风轻,当中应当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尤其考虑到《哈剌哈孙传》提到的事件走向是,秃剌由此“以功封越王,三宫尽幸其第,赐与甚厚,以庆元路为其食邑”^⑤等,我们便不难有合理的想象:彼时以皇子身份入宫的仁宗遭遇了强烈抵抗,甚至有性命之虞的可能。换句话说,如若不是情势危急,不是千钧一发之际亟需某种突破,秃剌绝不至于仅凭手缚阿忽台就得到上述诸多荣耀,达到“以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⑥的程度。因此,李孟令文人们艳羡不已的“赤手除蛟虎”之功,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项可凭个人建立的“奇勋”。事实上,此类事件非但必须有武力资源作为坚强辅助,而且仅就平乱方案的谋划和制定部分而言,《元史·陈颢传》中亦有“会成宗崩,仁宗入定内难,以迎武宗,颢皆预谋”^⑦的记载。

当然,《元史·李孟传》在叙事策略上将此事作为重点,把事情的发展主要依托于李孟的谋略和果决。这并不难理解,毕竟作为传主,其人生历程中的辉煌成就确实应当得到浓墨重彩的叙述。但是,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理应通晓事件始末详情的文人们来说,他们为什么集体出现了“部分失忆”的状况,不约而同地将旷世奇功记在了李孟身上,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我们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此进行说明。第一,从宏观上看,历史的书写本有着成王败寇的复杂一面,即便文学写作对历史现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艺术化处理,其精确性较之原始真相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终究源自那个现场,因此我们未尝不可以以诗文证史,借由文人们

① 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册,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40页。

② 同上书,第344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二四,第2册,第536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第11册,第3294页。

⑤ 同上。

⑥ “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剌疏属岂得以一日之功废万世之制哉。”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第11册,第3294页。

⑦ 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七,第14册,第4131页。

“心有灵犀”的笔墨对李孟为仁宗及其时代的付出多一分了解。第二,与《元史》本传的处理方式相仿,既然是以“李孟”为主题的创作活动,那么对写作对象表露夸赞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是在纯粹私人关系的文字酬答里,“今秦国公天子大臣,两定内难”^①的故事仍然萦绕在写作者们的心间;甚至在仁宗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没有必要再借李孟来对那段历史进行肯定和建构时,依然有人在以传奇化的笔法追叙他的巅峰功绩:“大德之末,丁国势危疑,神器机捏之会,犹操舟滟滪三峡,遇排山倒海之风,而能力赞秘策,卒底平济,非社稷之臣乎!”^②由此,我们也得到了以下第三重观察的维度。

反思史学认为,“在一社会群体中,不是所有人都自然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它常被群体中部分人宣称为该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在人际微观互动的社会过程(指亲近人群间通过语言、文字、肢体行为等等的展演、夸耀、模仿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之中,逐渐成为该群体之集体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过程,以及其对社会记忆之选择与组合,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③就大德十一年(1307)发生过的权力争斗来说,要求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将李孟“手拔乾坤虎口中”作为共同的集体记忆恐怕是不太现实的,至少在事件中留下姓名的哈剌哈孙、秃剌以及他们的族属都不会这样以为。但是,由于有一批文人针对这个话题留下了取材相近、主旨相似的文字记录,他们便由此通过语言,将李孟和仁宗及其时代的紧密关系塑形成了在朝文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和自我的双重建构。

程颐曾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自陈“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④,展示了一条得君行道的基本路径。有宋一代,前期有王安石之于宋神宗,后期有朱熹之于宋孝宗,无不在某种程度上以具体行动践行并实现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元代大一统王朝,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希望借由统治者的充分信任从而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抱负,却受制于多重因素而难于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李孟能从仁宗少年时代起便陪侍左右“罄陈所学”,其后更为仁宗即位与元中期盛世贡献直接力量。其以布衣身份而为帝王之师、贵极人臣而创治世之业的成就,无疑成为了普通士人于此时此地亦有可能得君行道的最佳注解,赋予了时人对于事功的更多期待与向往,也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妨说元中期一系列有关“李孟”主题的创作还从侧面展现出彼时士人的家国认同。

在集体化的写作中,文人们既充分表达着对仁宗儒治的称颂和对贤能宰臣的推崇,与此同时,也反复透露着个人身逢历史机遇的荣耀与渴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创作有意加重了李孟之于历史进程作用的笔间分量,从而臆想和期待个体的能量及其能对时代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它如何影响历史)不只在于此事件本身的性质,也在于(或更在于)它为何被人们记得,以及如何在叙事中被人们与其他事件以时空及因果关系相联结,以成为一传递特定讯息的社会记忆。”^⑤通过史料,我们当然能够意识到李孟对仁宗及其时代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文人们在赞颂李孟时殊为统一的笔调又让人看到他们的自我定位和期许。尤其是就平乱事件所作的文学化追忆中,出现了无论与史实真相

①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4册,第628页。

②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第129页。

③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140页。

④ 程颐《上仁宗皇帝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1页。

⑤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第157页。

还是经验想象并不完全相符的书写。这更展现出在来之不易的治世之下,文人们渴望像李孟一样有所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需求。

结 语

综上所述,李孟的忠君为国之心、功勋卓越的辅治之功以及内心长久的归隐渴望,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典范形象,满足了仁宗在其统治之初进行典范树立和道德构建的政治意图,亦与其以儒治国之理念相符。这引发了从老臣程钜夫、郝天挺到仁宗朝刚刚显露才名的文学新秀许有壬、马祖常等一众文臣的集体歌咏,展现出在朝文人对于时代的积极回应。从作品内容上来看,他们在仁宗爱贤尚文的明确态度里获得并表达着身逢其时的满足感,颂扬明君之世,歌咏时代新风,同时亦毫不遮掩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隐逸情怀,令这一时期的馆阁文学既呈现出激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无限接近传统中原王朝的神韵。从书写意图上来看,一次次的集体创作既彰显着文人们对所处历史情境的情感认同,也埋藏了各人心中的“大人”之梦,由此达成了文学对于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此外,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而言,将“李孟”主题诗写作的集中出现作为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现象,也有助于深化对元中期乃至元代文学和历史的探索与认识。

(刘育,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左 杨】